

■教育理论

教育的两个世界：百草园与三味书屋

王 兵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 陕西西安 710100)

摘 要:鲁迅以“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概括了成长过程中接受的两种文化,揭露了“三味书屋”正统教育的“文化权威”性质及其弊端,表达了对“百草园”这一全面发展寓教于乐学堂的颂赞。“百草园”生活诱发、强化了鲁迅的艺术审美性,拓展了文化视野与思维空间,使他从非主流文化中吸取了反封建资源,获得了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这是鲁迅成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重要因素。鲁迅从破除文化权威的整体性高度击中了传统教育的要害,同时切中时弊,启发我们反思当前日趋功利化标准化的教育理念与模式,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正确导向。

关键词: 鲁迅;百草园;三味书屋;教育世界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7)02-0007-05

PDF 获取: <http://sxxqsfx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2.002

The Two Worlds of Education: Baicaooyuan and Sanweishuwu

WANG Bing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Lu Xun described the two kinds of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his growing up in the books of "Baicaooyuan" and "Sanweishuwu", exposing the nature of "cultural authority" of the "Sanweishuwu" orthodox education and its malpractice, and expressing his praise for the life in "Baicaooyua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ntertaining education. "Baicaooyuan" induces and strengthens Lu Xun's artistic aesthetic, expands his cultural vision and thinking space, and draws his anti-feudal resources from the non-mainstream culture, and obtains individual freedom and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Due to these important factors, Lu Xun became a writer and a thinker. Lu Xun from the holistic height of cultural authority hit the key to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cut into the present-day evils, inspired us to reflect on the current increasingly utilitarian and standardize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model, gave a right direc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Lu Xun; Baicaooyuan; Sanweishuwu; education world

鲁迅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深情地回忆了儿时求学的一段经历,真实地描绘了童年时代的学习生活和情感体验,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有关教育的思考。

这篇散文的题目和内容都标示了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这是作者儿时经历两种生活环境,它们都给作者留下了深刻记忆,并对其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通常,人们把正式进入学

堂视为受教育的开始,这篇文章却把常人眼中的化外之地百草园与代表正规教育的三味书屋相提并论,以对比的方式展现了二者在儿童心理上的反差,激情地抒发了对百草园的怀念和热爱,表达了对正统教育的反思质疑,十分耐人寻味。

一、教育的化外之地:百草园

所谓化外之地,是指文明地区以外的地方,或是

正统教育未能统摄的区域。化外之民通常被认为是蒙昧的或野蛮的,因未经教化而缺乏文明人所应有的品德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教化的民族,有着渊源流长的教育理念,在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孔孟之道被奉为神圣之道的文化背景下,国人对于那些未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异族边民常有所歧视,称之为蛮夷或禽兽。同样,对于那些没有接受正统教育的人,则以未开化或愚顽视之。尤其是在以科举制度为选拔人才唯一途径的社会环境里,脱离正统教育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无望,因此,进入正规学堂接受正统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几乎是成才的必经之路。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绘的就是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心理,家长把孩子送入享有盛名的“三味书屋”接受教育,结束了在百草园嬉戏的“野孩子”生活,认为这才是一条充满希望的人生正路。

与三味书屋的正规教育相比,百草园可谓化外之地,是一个缺乏人为的教育意识、也无明确的教育内容、更谈不上教育目标的天然游乐场。通常,人们不会认为孩子在这种环境中能得到良好教育,相反,它往往被当作教育的干扰因素而予以禁戒,因此,文中的家长老师都尽可能阻止孩子们在园中过多玩耍,把强迫他们进入学堂当作应尽的义务。而作者却以大量笔墨描绘了百草园的美好生活,热情洋溢地颂赞了这段经历带来的丰富体验与感受。

“百草园”在作者笔下是指与正规学堂教育相对应的自由生活状态,因此,它应当包括两个阶段的内容,一是进入书塾之前的百草园生活,一是进入书塾之后脱离老师管辖的自由活动,这包括三味书屋后面小园子里的课间休息和课堂上不专心听讲的私下游戏。这些内容都属于正统教育之外的世界,它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与收获。

百草园,这个常人眼中“只有一些野草”的荒园,在作者笔下却是“我的乐园”。鲁迅以诗意的笔调描绘了它的多彩景象和奇妙故事。在这个自由自在的世界里,孩子们被激发了直觉的审美感受力,强烈地体验了大自然的奇幻美妙。那些“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以及“鸣蝉的长吟”,“油蛉的低唱”,“蟋蟀的弹琴”和“直窜向云霄的叫天子”,诱发了孩子在色彩、形象、节奏、韵律等方面的观察力和鉴赏力,那个吃了会成仙的何首乌的传说,深深地吸引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以至于弄坏了泥墙,也不停止对它的寻觅和

幻想。

即使在凋零的冬季,百草园也有别样的景致和趣味。堆雪人还在其次,雪天捕鸟不仅使孩子们认识了许多兽类的习性,也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训练了耐心、毅力、胆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及敏捷的行为能力,这项活动如同现代教育提倡的实践性教学,从内在心理、外在行为及知识性、应用性上全面培养了孩子们的认知与技能,而这都是在富有乐趣的游戏获得的,期间承受的寒冷、劳力都不觉辛苦,反而成为了一种享受。

百草园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活动,就是长妈妈讲述的神话故事。这些荒诞不经且无教育寓意的传说,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佣口中讲述出来,远比课堂上老师传授的名篇佳作精彩,它深深地打动了孩子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长妈妈是中国民间最普通的劳动妇女,她没有过人的品格和智慧,在文化人眼里,尤其是正统的教育家看来,她口中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若施之于教育,实在是很低劣、愚昧,但她却给后来成为文学家的鲁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鲁迅多次撰文回忆她,笔触所及充满温情,她是鲁迅成长过程中少有的相处自然、随意的长者。在一个等级森严、拘泥于礼法的社会环境里,家长老师很少给予孩子如此平等轻松的交流。长妈妈讲述的故事和赠予的《山海经》画本,为鲁迅展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这些不经意的作为,对于诱发鲁迅的形象思维和想象力,引导他进入一个超越现实的艺术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鲁迅后来成为文学家不可或缺的因素。

进入三味书屋之后,在老师严厉管束的空隙跑到后园爬树摘花,捉苍蝇喂蚂蚁,或在老师念书入神时偷偷地画画儿、用纸糊的盔甲在指甲上做游戏,这类活动都是百草园生活的延续。这些看似越轨的行为,缓解了严厉的教育手段造成的紧张心理,调节了枯燥的课堂教育带来的乏味情绪,使百草园时期养成的生活热情得到了有效维护。

百草园生活是以儿童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儿童主动参与、积极探索的热情,在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的驱动下以娱乐的方式实现了认知与技能的培养,同时促进了儿童情感世界的丰富和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这些原本就是教育所应致力的目标,在这方面,百草园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从这一角度看,百草园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化外

之地，而是一个培养儿童全面发展的寓教于乐的学堂。

二、教育的正统课堂：三味书屋

与百草园的自由愉悦截然不同，三味书屋是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也因此被认为是最好的教育场所。

一进书塾的门，首先学会的是敬拜。即使没有孔子的牌位，敬拜之礼也不可或缺。“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于是，三味书屋的教育便被禁锢在圣人和先生的权威之下，拘囿于人为设置的规范和标准。

与百草园那个丰富生动、妙趣横生的世界不同，三味书屋面对的只有单调的课堂。老师的严厉，气氛的紧张，课文的深奥费解，都令人压抑。老师虽然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但他除了“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的诵读姿态吸引了学生的注意之外，他讲授的课文对孩子们来说如同天书，既不知所云，也毫无兴趣。当“我”恭敬地请教这位先生关于“怪哉”的疑问时，他不仅拒不回答，而且“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这无异于给好学的孩子泼了盆冷水，使他求知的欲望之火熄灭了。作为一个专为他人解惑的职业教师，为什么会以如此态度回应学生的提问呢？文中的“我”认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乃是不愿意说。”孩子因老师以渊博著称就相信他无所不知，而事实上，无论多么渊博的人在浩瀚无垠的知识面前都所知甚少。这位先生若是真不知道，就应当坦诚面对，使孩子懂得学海无涯与人类智慧的有限，并借此激发孩子不断求知的热情。假如这位先生知道答案却不愿回答，那么很可能源于教育理念的僵化保守。作为教育的施与者，他认为有权对学生的学习范围、内容和方式设置严格规定，超出界限就是违规或大逆不道，故以拒不回答予以警告，这是以“拜权威”为特征的三味书屋教育特有的现象。文中没有说明先生对这一提问究竟是否知道答案，这并非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无论这位先生是否知道答案，他的表现都暴露出一位教师在教学态度和理念上的虚伪、冷漠和偏执。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位先生的表现并非个别，而是正统教育的普遍特色，因此，文中强调“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与百草园相比，三味书屋的教育家既没有长妈

妈善讲故事，能打动人心，也不如闰土父亲能以高超技艺赢得孩子们的钦佩，相反，他只会用“戒尺”、“罚跪”和“瞪几眼”的手段，强令孩子们屈服在权威之下。作者以对比的方式，揭露了所谓“方正、质朴、博学”的先生盛名之下傲慢古板、偏狭粗暴的性情，嘲讽了正统教育名不副实、失不中的特质。

三味书屋教育通过严厉的管束与刑罚，使孩子们学会了识字及三言、五言、七言的写作技法，这是正规学堂教育的成果，也是正统教育考核的主要内容。在这方面，三味书屋教育并未失职，也并非无益，而是成绩斐然。但遗憾的是，识字、读书和写作，这些原本富有审美性和创造性的艺术，在三味书屋教育中变成了僵死的教条、空洞的说教，成为了孩子们不得不面对却毫无兴趣的东西。在百草园中培养的对美的敏感，对世界的好奇，对诸多事物的热情在三味书屋枯燥的课堂里消磨殆尽。三味书屋重视单一的知识技能灌输，缺乏对孩子们心灵、情感和想象力、创造性的培养，于是，原本具有吸引力和感召性的学习变得单调乏味，孩子们鲜活的个性和生命潜能也遭到了扼杀。那些学到手的知识技能，一旦脱离心灵、情感和独立思考的生命机能，便如同没有灵魂的躯体，丧失了应有的神采和价值。

百草园与三味书屋，在常人眼中，一个是教育的化外之地，一个是教育的高明处所，然而在鲁迅笔下却有了完全不同的褒贬倾向。这篇散文对两个世界的描述笔法上也有明显区别，当文笔触及百草园时，作者便掩抑不住激情流露，于是有了抒情诗般的审美效果，写到三味书屋时，则笔调冷静，情绪内敛。这两种不同的描写方式，表明了作者不同的情感态度。鲁迅没有盲从传统观念和世人习见，而是以亲身感受对两种教育做出了评判。文章结尾写道：“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这既是对三味书屋教育的总结，也是对正统教育貌似含蓄实则尖锐的嘲讽。教育的真正效果不是从正规课堂获得，而是在不专心听讲的私下游戏中产生，这无异于是对三味书屋教育的否定和批判。

三、教育的救赎之道：对“古城”的突围与逃逸

鲁迅在散文《自言自语》中讲述了一个小故事：一座建在沙山中只有一个“闸门”的“古城”，住着少年人、老年人和孩子。少年人发现“沙积高了，活不

成了”，便“拼了死命，举起闸”让孩子“快逃”。老年人却认为少年“胡说，没有的事”，少年说：“快走罢！这不是理论，已经是事实了！”于是故事在波涛般袭来的黄沙中结束了。^{[1]92}

这个故事使人想起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结尾“救救孩子”。这是一个洞悉身陷牢笼、濒临绝境的先觉者奋不顾身解救孩子突围逃逸的故事。文中的少年无疑是鲁迅这一代启蒙者的自况，它表达了对儿童及后代深切的忧虑与关爱。在这个故事里，古城的危机既源于建造在沙山上，根基不稳，也源于禁锢的高墙和关闭的闸门，它使人看不到真实的处境，因而无法摆脱死亡的威胁。显然，这个故事具有寓言性质，有着丰富的寓意。这里的“古城”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铁屋子”一样，都是“吃人”的专制文化的象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叛的对象。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结合起来看，那么，这个“古城”也可以从更为具象的教育角度来理解，它可以看作是三味书屋正统教育的象征。《古城》讲述了一个文化突围的故事，这个建立在人为的文化权威之上的历史悠久的教育体系，犹如建造在沙山上的古城，因其偏狭的教育理念和单一的教育手段而天地狭小，令人窒息，而这一权威教育所特有的封闭性、排他性如同古城的高墙与闸门，使人深陷绝境却不知其危。只有从这壁垒森严的文化禁锢中突围出来，才能死里逃生，获得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作者以三味书屋例行的“一拜孔子，二拜先生”的仪式，形象地揭示了正统教育特有的“文化权威”性质，而三味书屋教育的种种弊端，如不以儿童为本位、脱离儿童的天性、限制个性的发展、教育理念和手段的偏狭粗暴等，都是这一“权威”意识造成的结果，鲁迅切中要害地揭示了三味书屋教育致命的病根。

对以正统文化自居的权威教育的突围与逃逸，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品的主题。这一富有现代性的教育思想，不仅源于鲁迅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也来自于家族几代人在功名沉浮中的经验教训。鲁迅祖父在科举狱案的巨大打击中终于醒悟，对曾经盲目追崇的正统教育产生了质疑与反叛。他不再要求儿孙读圣贤书，而是鼓励他们读闲书。周作人说祖父有一个“很特别”的教育法，就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2]133}他曾对周建人说：“四书五经，你也不必读了，读这些书，很花功夫，用处也

不大。”^{[3]24}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四书五经是正统文化的神圣经典，小说却是在下层民众中流传的与高雅文学相对应的通俗文学，为人所轻视。祖父这种崇尚小说蔑视经典的创见，为周氏兄弟从主流文化之外吸取营养提供了可能，也奠定了基础。这一开明思想营造了宽松的家庭文化环境，使周氏兄弟在接受主流文化之外，大量接触了被正统文化视为低俗或异端的民间文化，如神话传说、野史杂谈、小说戏曲、乡风民俗等。周氏兄弟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思想观念不致定于一尊。

鲁迅以“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概括了他成长过程中接受的两种文化，表达了对这两种文化的情感态度。事实上，“百草园”所代表的边缘文化或异端文化为鲁迅的成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鲁迅成为文学家、思想家打下了基础。周作人说：鲁迅“工作的成就……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从小就喜欢书画……这些事情都很琐碎，可是影响却颇不小，它就‘奠定’了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还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4]151-153}周作人所说的“书画”，就是“百草园”生活的主要内容。鲁迅研究专家阎庆生说：“幼年鲁迅对绘画的爱好，是与他他对大自然（包括学校后面的‘百草园’）的热爱和奇异神秘的人生世界、神话世界的强烈好奇心联系在一起的。”^{[3]26}百草园美丽的大自然、奇妙的神话传说、趣味盎然的绘画和游戏，对鲁迅形象思维的形成和艺术审美性的培养功不可没，这是决定鲁迅后来弃医从文，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所不容忽视的内在因素。

“百草园”冲破了主流文化的禁锢，为鲁迅打开了更为丰富广阔的世界，提供了看待社会人生的新视角，也使他得以在两种文化的相互参照中更全面地把握信息，洞察明辨，萌发独到见解，从而避免了对主流文化的盲从，获得了对社会人生的超越性认识，这正是鲁迅成为思想家最重要的特质。鲁迅一生多次“走异路、逃异地”，这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生活道路的选择，更是一种另类的文化选择。这种不从众、不流俗的特立独行虽然基于多方面原因，但显然得益于他在两种不同文化参照中所激发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独立。这种儿时就形成的开放意识，为他后来能够积极接受更具异质性的西方文化打下了基础。通常，人们认识到了西方文化在鲁迅反封建思

想形成过程中的重大影响,但相对忽视鲁迅儿时就具有的从中国传统的非主流文化中吸取反封建文化资源的特点,这是鲁迅反封建思想形成最初期、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是鲁迅思想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从鲁迅的成长经历和人生经验上看,被正统观念所轻视或否定的“百草园”生活更有益于人的健康发展,更符合人性与人道,更有利于人的身心灵的全面培养。事实上,当正统文化的权威僭越了天道人道,对人的天赋秉性造成压迫摧残时,与正统文化对峙的异端文化就体现出了必然的合理性。早在封建文化尚未完全崩溃的时代,曹雪芹就在《红楼梦》中塑造了被封建正统观念视为“孽障祸胎”的贾宝玉形象,表达了对正统文化的反叛出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青年》为阵地的先觉者们更以倡导“异端邪说”为旗帜,宣告了对正统文化权威性的颠覆批判。鲁迅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是这一时代文化的生动体现,它从破除文化权威的整体性高度击中了传统教育的要害,对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导向。鲁迅并非专门的教育家,他的散文也不是教育研究的专业论著,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只是恪守了艺术真实反映生活的信条,惟其如此,他的这篇并非专门探讨教育的作品才有了更加值得关注的意义。这是一个有着深刻体验的受教育者在曲折的人生经历中真诚思考所发出的心声,是一个付出了艰辛代价而取得成功的智者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在《古城》这个故事中,少年以“这不是理论,已经是事实了”强调其见解的合理性,同样,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提倡的反权威,突破正统教育文化禁锢的思想,不仅符合现代教育理论,也被他的成长经历所印证,具有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

经典的艺术作品,总是既书写了历史,又影射了当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散文同样如此。反观目前的教育现状,鲁迅文中所揭示的问题不仅没有成为过去,反而正中时弊。当前盛行的以应试与就业为目的导向和评价标准的教育模式,重知识灌输而忽视情感心灵的开发,重标准答案的认同而轻自主思考的探索,将教育过分局限于课堂与书本,剥夺了大自然与日常生活对受教者的熏陶,这一切,都是“三味书屋”教育在当代的延续。这种偏执一端、急功近利的教育正如“古城”故事描绘的危机景象,已经暴露出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果十分令人担忧。教育是有关身、心、灵的全人教育,它面对的

是每一个人的不同个性、不同生命潜能和难以预测的发展前景,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超越了人的有限认知,是人所无法完全掌控的。在这方面,任何即使是正确的理念、方法或目标侧重都无法涵盖教育的所有领域和内容,都不可能提供适宜于每一个人发展的统一模式,与其将某一种理念、方法定于一尊,不如解放思想,大胆放手,让受教者有不同选择和多方尝试的机会,让教育在不同理念与方法的多样探索中自由发展。并且,应当给予受教者一定程度地脱离人为教育而自然成长的空间,以避免人为教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而产生的偏差和局限,这就是鲁迅笔下“百草园”生活的意义所在。目前,在基础教育第一线执着坚守、奋力突围的杨林柯老师说:“我一直反对各种上课的模式和固定标准,不拘一格才有创造和自由……如果承认教学是艺术,就不应该设立标准,因为艺术无极限,只有技术才需要标准。”^{[5][117]}标准本是一种成功的经验总结,而一旦成为权威,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变为扼杀其他成功因素和途径的杀手。杨林柯说:“教育要让每一个生命在合适的土壤、空气、阳光中自由生长,而不是被集约化地灌装、雕刻、同化。”^{[5][116]}事实上,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者双方在教学相长中不断突破自我与文化的限制,释放无限生命潜能的过程,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已知世界的操控者”,而是“未知世界的探求者”。^{[5][121]}面对当前日趋功利化标准化的教育现状,其救赎之道首先在于对这一权威模式的突围与逃逸,否则,任何教改都将是扬汤止沸、望梅止渴,这是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深刻总结并以亲身经历印证了的事实,是值得吸取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 [1]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 [3] 阎庆生.鲁迅创作心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4] 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5] 杨林柯.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